



“西学东渐”与上海近代体育的嬗变(1843-1949年)

匡淑平

摘要: 体育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物化载体,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进入中国。由于西方体育文化与东方传统体育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使得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传播必然受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抗拒,因此,体育领域中的“西学东渐”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冲突的过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整理,总结出:近代上海体育在西方侨民体育的示范和引导下,走上从惊诧、排斥到调和、吸纳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历程,完成了对西方近代体育从吸纳、比照、融通的3个递进的演进过程,实现了西方体育在中国本土化的“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上海民族传统体育也经历了“解构”到“建构”的痛楚,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西学东渐;嬗变;近代上海;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5-0018-07



"Western Culture Moving Eastward"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ports in Shanghai (1843-1949)

KUANG Shuping

(School of Sports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Sport, as a materialized carrier of Western cultur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Due to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sport culture and Eastern traditional sport culture,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modern sport culture is destined to be resisted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 culture. Therefore, Western Culture Moving Eastward in sports field is a process filled with contradi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odern sports in Shanghai, with the example and guidance of Western expatriate sports, have undergone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astonishment and rejection to reconciliation and acceptance while facing Western modern sports. Thus, a three-step course of acceptance,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And Western sports have realized its mission of transmi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Shanghai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have also experienced the pain of decomposi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Western culture moving Eastward; evolution; modern Shanghai; sport

“西学”,从知识的形态来说,是指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和人文科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又可解释为近代西方文化,这里的“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3个层面。“西学东渐”这一概念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是用来表述西方文化输入中国过程的形象的裁略语。近代西方文化的“东渐”并不是简单的传输过程,而是两种异质异域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总体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逐步接纳和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体育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物化载体,是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进入中国的。由于西方体育文化与东方传统体育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使得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传播必然受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抗拒,因此,体育领域中的“西学东渐”也是充满着矛盾冲突的过程^[1]。

1 “西学东渐”与上海近代体育的萌芽(1843—1911年)

1840—1911年,是整个中国社会从封建制王朝走向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上海近代体育还未完全进入中国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它只是在沪西侨生活圈中的一种“即兴”或“消遣”活动。作为具有西方文化内涵的“体育”一科,在这个时期仍然处于启蒙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上海城市正处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轨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上海人对外国侨民中的体育活动,由开始的惊诧转变到后来的接受和模仿^[2]。

1.1 西方侨民的体育活动与体育组织的示范与引导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8年,英国人在今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兴建一个占地81.7亩(约54466.66m²)的跑马场,拉开了西方体育在上海传播的序幕^[3]。1850年成立跑马总会,1851年举行第一次赛马,英国侨民对西方体育在上海的传播起着先导作用。随后,美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国侨民先后接踵而至,开展室内保龄球、室内墙手球、划船、赛马、板球、健身体操、网球、足球、田径、游泳、棒球、高尔夫球、帆船等运动项目^[4]。到清末,“当时欧美社

收稿日期: 2016-08-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4YS072)。

作者简介: 匡淑平,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体育史和体育文化传播。E-mail: kuangk@sus.edu.cn。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 党委宣传部,上海 200438。



会流行的大多数体育活动都已在上海西侨社会中露面”^[5]各种体育组织纷纷出现,综合性的俱乐部有英国总会、德国总会、法国总会、俄国总会和花旗总会等,体育是这些组织中的必定活动^[3]。创建的体育专业技术性很强的俱乐部有:上海跑马总会(Shanghai Race Club)、上海足球总会(Shanghai Football Association)(华人称西人足球联合会,简称西联会)、板球总会、网球总会、棒球总会、草地滚球会、越野总会、划船总会、游泳总会、上海万国象棋会等^[6],这些体育组织举办了一些在上海,乃至在中国来说都是“首次”的体育比赛,如1851年第一次赛马,1852年第一次划船比赛,1858年第一次板球比赛,1892年第一次游泳比赛。组织开展的延续性、影响力大的竞赛活动有史考托杯足球赛(Skottowe Challenge Cup)、足球联赛、万国足球赛、埠际足球赛、万国运动会、万国越野跑、万国竞走赛等。西方侨民的体育活动的开展与体育组织的创建开上海近代体育风气之先。由于西方侨民最初的排华行为非常明显,其体育组织和运动场所均禁止华人参加或进入,加之中西体育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西方侨民开展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未向华人社会扩散开来^[7]。此时,华人只是作为“看客”,对西方体育感到“稀奇”,带着“诧异”眼光来观察记录。欣赏、好奇是基础,上海市民对西方体育逐渐产生了兴趣,后来才广泛全面地进行吸纳^[8]。

1.2 教会学校的传授

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和西方侨民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上海创办的不少教会学校。1839—1860年,上海早期的教会学校有15所^[9]。至1911年,天主教在上海设立的教会学校达28所(含读经班、识字班)^[10],基督教在上海设立的教会学校达36所(含读经班、识字班)^[11]。教会学校大多建有体育组织和体育运动代表队,并附有运动场地,有较好的体育设施。除教授兵式体操外,还开展了以田径、球类等竞技项目为主的体育活动内容。学生在教会学校接受系统性西学课程后,也就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观和理论观念扩散于家庭,辐射至社会,从而使西方体育通过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在上海社会上传播^[12]。

对上海近代体育产生最大影响的教会学校是圣约翰大学:一是最先在上海教会学校中开展各类近代体育活动,其体育项目几乎包括所有现代体育项目;二是将体育竞技的观念和比赛带给了中国人。1890年圣约翰大学举办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最早的学校运动会,1902年,和南洋公学发起校际足球赛,开创了上海近代体育史上校际足球比赛之先河。此后,校际体育活动呈现常态化,上海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中西书院、东吴大学等4所学校成立了“四大学体育联合会”,1904年至1908年举办了5届田径运动会,对近代上海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起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上海女子教会学校中也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上海乃至全国的女子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13]。

1.3 基督教青年会的提倡

190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1906年,青年会在四川路建成会所,设立了健身房、墙手球房、弹子房、游泳池等体育娱乐设施^[14],1908年成立体育部,吸收各校的中国学生以及社会人员从事体育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体育起着重要的传播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具有现代特点的体育活动,培养学生比赛和竞争的观念,如1904年倡导举办首次学校联合运动会^[15],1906年6月和10月相继举办了运动大会。

二是培训竞技体育人才和体育师资,奠定了上海近代体育发展的基础。1914年青年会举办了体育干部训练班,1917年创办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早期体育事业的骨干力量,其中一些人锤炼为著名的体育家和体育事业领导者。基督教青年会还专门成立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出了第一代女子体育师资人才,如张汇兰等,对普及中国近代女子体育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组织与参与全国和国际性体育比赛,扩大了早期上海近代体育的影响,如1910年指导开展“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一次全新形式的运动会,“它以田径、球类等近代体育中较正规的项目及竞赛方法进行比赛”^[16],后被迫认为近代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从此,全国运动会成为一种竞赛定制,近代中国先后举行了7届全国运动会。

四是出版书籍,传播西方体育思想和文化,使近代体育向全中国辐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出版书籍介绍近代西方体育理论、体育技术、体育竞技比赛规则以及体育运动会的举办方法等,从而为上海近代体育的规范化发展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使得西方体育在立足上海以后,能迅速向内地扩展,体现近代上海对全国体育的辐射作用^[2]。

1.4 强国强种、革命尚武精神的内在需求与驱动

在19世纪末期,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人士在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时,都已自觉地将开展体育运动作为实现各自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严复在《原强》中、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均论述尚武、强国精神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这些体育主张以后被以孙中山、蔡元培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自19世纪下半叶始,他们最先将具有军事组织性质且具有强壮体魄作用的西方“体操”,引入了中国;并将“体操”锻炼与培训近代军事工业人才、革命党人武装起义骨干紧密地联合起来。

1.5 上海对西方体育的模仿、接受与实践

在西方体育的引导和示范下,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声呐喊和组织下,上海近代体育融入了时代的内容,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在“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主”的革命口号下,上海近代体育与中国近代革命联为一体,在宣传革命思想、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惊诧—接受—模仿—实践,上海开始走上从排斥到调和、吸纳西方近代体育的历程^[17]。



早在19世纪末,中外绅商创办的新型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对学生进行体育教学,如1878年创办的梅溪书院,对学生教授中国本土的投壶、射箭、八段锦等,与西方意义上的体育内涵不一样,但有异曲同工之效。1903年,中国的“癸卯学制”颁布后,上海的中小学大多开设了体育课,学校体育自此确立^[18]。

20世纪初,上海市民开始模仿西方人建体育场、成立体育社团和创办体育学校,在中国人中开展西方的体育项目。如:上海商人叶贻铨于1908年在今日的五角场附近圈地700多亩(约466 666.67 m²)建成江湾跑马厅;1905年上海商人虞洽卿在租界地区发起创立华商体操会;1905年由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何东创办松江府娄县劝学会体操传习所;虞洽卿、徐傅霖、徐一冰、王季鲁等人于1908年创办中国体操学校,1910年7月创设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总体来说,最初伴随着西侨进入上海的“西方体育”,首先以租界侨民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出现在中国人眼前,这种娱乐方式最为重要的载体是竞赛,如赛马会、赛船会等等。虽然“西方体育”最初是以纯粹休闲娱乐方式出现在租界,但很快带上功利的性质。因上海当时是对外开放的商埠,西方侨民到上海,大多是为了开展商业活动,体育开始被利用为商业周旋与人际交往的手段,甚至成为一种标榜身份的象征,而诸多的体育组织纷纷出现。如划船总会、板球总会、棒球总会、网球总会等等。这样,体育除了娱乐性外,还以商业化、功利性、组织化的特征出现在国人面前,体育与整个城市的休闲娱乐、人际关系、城市建设、商业发展等密不可分,体育的进入一方面展现给我们现代都市的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的入侵。“西方体育”在经历了一次次中西文化冲撞的思潮洗礼,在中国国民经历了一次次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之后,才逐渐融入中国本土。在西方体育运动刚刚传入的前几十年中(如文中所述,上海近代体育的萌芽期就特别长,1843—1911年),中国上海的市民最初仅仅只是看客,有的西侨会所甚至禁止中国人入内观看^[19]。最初,中国国民对于西方体育也是有抵触,但由于基督教青年会、教会学校等的主动传授,看到西方体育运动的健身和娱乐价值,而且由于中国强国强种、革命尚武精神的内在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上海市民开始学习各类体育运动项目,参加各类体育活动或者竞赛。

2 “西学东渐”与上海近代体育的形成(1911—1927年)

1911—1927年是军阀混战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上海城市发展取得较快发展的一个时期。上海城市的发展为上海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使上海体育在融会中西体育文化思想中获得新生,也逐渐实现从传统体育向近代体育的转型。这一时期,西方的体育观念和方法已经被多数市民所认同,处于接纳—共处发展过程之中^[20]。所谓接纳,是指这个时期的西方体育运动项目,已不单纯只是萌芽状态时期西方人生活圈中的一种文体活动和少数教会学校及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涉足活动的

领域,而已从特定的圈子走向社会,走向平民百姓的生活。所谓共处,也就是这个时期的体育运动,已脱离了早期华人与西方侨民各自单独开展的形式,而在同一个体育场或同一个运动场上,和平共处进行比赛。

2.1 新式体育学校的建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27年,在上海开办的新式体育专业教育学校有十余所。其中较重要的有1914年成立的上海爱国女校体育科,1918年成立的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25年成立的东南女子体育学校,1923年成立的上海体育师范学校,1922年成立的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1924年成立的上海沪江女子体育学校^[21]。这些体育专门学校中有相当部分是致力于培养女子体育师资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上海女子体育运动的兴盛。

2.2 各类体育管理组织的崛起

在形成时期的上海体坛,由国人组织的体育管理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业运动组织,主要有1914年成立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和上海自行车会,1918年成立的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1922年成立的上海中华网球联合会,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和中华足球联合会,1925年成立的上海网球联合会,1926年成立的中华棒球联合会和上海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年成立的上海中学体育联合会。这些体育组织中最具影响的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育协进会”,它是该时期最重要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是具有管理功效的体育组织,是“中国奥委会”之前身。

另一种是专业或业余的体育运动团队,主要有白虹运动队、三育体育会、新华球队、水星体育会、白队篮球队、霞光乒乓球队、骷髅健身团、黑白女子篮球队、华东足球队、乐华足球队(后更名为乐华体育会)、蓝白田径队、黑白女子篮球队等^[22]。三育体育会、乐华体育会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开展民间社会体育运动的团体,在与西方侨民的体育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他体育团体也对促进单项体育运动的发展、社会体育的繁荣兴旺等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23]。

2.3 各类体育场馆的兴建

体育场馆既是体育赖以生存的必备物质条件,又是人们进行交际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数量多寡、条件优劣往往是一个地区体育兴旺发达的晴雨表。近代上海早期的体育场馆绝大多数是由西方侨民修建的,按粗略统计,自1848年英国人开设第一个跑马场至1911年,这期间西方侨民在上海修建的运动场地就多达20余个,而国人建造的体育场却只有一个,即1909年由巨商叶贻铨等人集资建造的江湾跑马厅,后因资金不足,还被西方侨民接管,改称“万国体育场”。可以说,西方侨民垄断了体育场馆,从另一层面说,就是垄断了西方体育活动,国人只能充当“看客”。1911年辛亥革命后,这种局面得到改变,国人开始自建体育场馆。1917年3月30日西门公开体育场正式建成,1928年改称为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1925年中华全



国体育协进会在天文台路(今合肥路)又建成了中华运动场;1926年张啸林、范四春在江湾引翔港建成了远东公共体育场(又称上海第三跑马厅)。这些体育场馆以国人集资、民间捐赞、政府出资等形式筹资兴建。这些体育场馆的兴建对刚从萌芽状态苏醒过来的近代体育无疑是一种催化,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体坛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24]。

2.4 错位的体育领导权开始转化

上海近代体育自19世纪中叶起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体育教育、体育项目内容、体育竞赛规模、体育社团数量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当时的中国体坛存在一个极为怪异的现象,即笼罩着“体育殖民”的怪圈。这种“体育殖民”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近代中国体坛上体育领导权的错位。当时几乎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所有国内外重大赛事,均由外国人主掌。如被认为标志中国近代体育之始,于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运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乃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埃克斯纳;1914年全国第二届全运会的主持者乃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A.H.Houglund)。1915年、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远东运动会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192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会上竟然发生了由侨居上海的美国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格雷(J.H. Cray)作为中国代表登台演说,由此再次引发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产生的收回体育主权的强烈呼声。1924年5月在武昌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虽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但仍然有一些项目的裁判权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于是趁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之时,各界有志人士共同倡议成立全国体育组织。经过筹划,1924年8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从此结束了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局面,标志着中国人自行管理体育竞赛的开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审编国人各项运动规则、审订各项运动纪录、解决运动赛事难题、选拔参加各种国内外重大赛事的运动员,及参加各项世界体育单项联合会的事务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1931年它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接纳为会员,成为中国奥委会的“前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在它的管辖下又先后成立了中华足球联合会、上海篮球联合会、上海网球联合会、上海棒球联合会、上海裁判会,租地建造了中华运动场,并将1927年8月举办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25]。

2.5 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开始融合渗透

西方体育观念和手段的输入,使中国传统体育的观念和训练方式受到了挑战和冲击。一些武术界的强才高手开始醒悟并借鉴西方体育的观念和手段来改造传统体育。他们甩掉武林中帮派林立、以强欺弱、助纣为虐的恶习,还远离了辛亥革命“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尚武”风气,而将“武术”的“实用价值”转到重在身心锻炼、道德修养、审美要求的轨道上。1919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又将具有西方体育观念的《中华新武术》列入全国学校的课程表里。1923年4月在上海市西门公共体育场开

幕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期间,还进行了类似西方的学术研讨会。自1919年至1927年,上海地区成立的主要武术团体就多达二十余个,其中最著名的是1910年创办的上海精武体育会。该会不将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对立起来,而是以武术实践为主,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民间体育组织,而且成为近代史上融合中西体育精神的领头羊^[26]。

精武体育会融合西方体育思想与理念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传授方式的变革。为排除武术界的迷信色彩,精武体育会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一是把原来的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单线条模式,改为以办班形式公开授拳;二是主动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拳师们主动到各学校承担武术教学任务。

第二个方面是在教学内容与教学管理上有创新,教学内容为创缩与规范后的传统武术套路,即“精武十套”,每个套路的起承转合、含义与要点、运行线路都有明确规定,并且借助直观感性的、图文并茂的挂图和武术教材予以教学^[27]。教学管理上实施以星带段的鼓励机制,即用三色星分别代表武术训练的不同等级,缀饰于精武会会服上以彰级别。

第三个方面是在武术传播方式上创新。一是著书办刊,据上海体育文史委员会搜集,至1990年,仅上海地区就发现精武书目达63种^[28],精武体育会所著书籍及组编教材中以“精武十套”最为著名;二是精武体育会率先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辅助教学与宣传武术。自1916年陈铁笙拍摄“潭腿一路”开始,随后精武教材及出版书刊的相关武术内容大都配有照片,以方便教学;三是积极开辟分会,借助分会的集散效应传播武术。据统计,截至1928年,共成立分会42个,会员约40万人^[29]。

3 “西学东渐”与上海近代体育的兴盛(1927—1937年)

1927—1937年是一个相对和平、相对稳定的时期,军阀混战结束,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国民党逐步在全国建立起统治,国民党政府励精图治,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近代中国体育也进入较快速平稳发展时期。在全国整体体育良好的发展态势下,随着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上海近代体育在已开风气的基础上获得了快速繁盛的发展。

3.1 体育制度化建设初具规模

在1931年5月2日颁布的《上海市政府组织规则》中,上海市政府下设一处八局,体育归属于教育局中,明确设立民众体育股,对于民众体育如何开展及管理作了明确规定,但对于学校教育中的体育教育不甚明晰。到1933年教育局把分工再度细化和专业化,成立了上海市教育局体育委员会和健康教育委员会,对两个委员会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从而使得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具体规划。两个委员会的成立,一方面遵循了国民政府的体育理念,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当时对体育的最新解



读,把体育理解为教育与健身,并把体育实施至每一个国民的每一个年龄阶段^[30]。

3.2 民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民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运动竞赛。学校方面有:1928年第一届全市小学体育联合运动会(1928—1948年共举办过12届),1928年第一届全市中学体育联合运动会(1928—1935年共举办过6届)。社会方面:1930年第一届全市运动会,1929年第一届民众业余运动会,1931年第一届上海市长跑赛,1934年第一届上海市竞走会,1934年上海市第一届工人运动会等。社会上专事近代体育的职工体育社团纷纷出现,20世纪20年代有三育、乐华体育会,20世纪30年代有东华、华联、丽都、百乐门、进德等体育会。从行业看,以银钱业、邮电业、烟草业体育活动最普遍。1939年银行钱庄的篮球联赛,参赛队达21队,乒乓球联赛有26队。邮电乒乓球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最强的队伍之一。烟草业组成颐中体育会,开展乒乓球和小足球运动^[31]。

3.3 竞技体育运动百花齐放

这一时期,近代上海竞技体育事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色,国际国内赛事不断,有国人主办的,有西侨主办的,也有中外共同主办的^[32]。

一是大型体育赛事不断。上海在1915、1921年承办第二届、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的基础上,又于1927年8月27日—9月3日承办第八届远东运动会。1935年10月10—20日又承办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二是竞技体育转向市场。许多工商企业利用体育效应,纷纷加入各种以企业名称命名的奖杯竞赛。如1926年至1930年,以上海通商银行命名的“通商杯”就举行过7届^[33]。

名目繁多的各类竞技体育运动的比赛,使上海的各项运动成绩居全国之首,巩固了体育“领头羊”的地位。“如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17个锦标赛中上海队获得9个锦标,所设的39项田径项中上海获得14项;在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17个锦标中上海获7项,16个田径项中上海队获得15项”^[34]。

3.4 体育宣传日趋成熟

近代上海的体育报刊经过1911年前的萌芽,1911—1927年的发展,到1927—1937年时已较为成熟。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相继发生后,上海政府因为“体育救国”呼声高涨,遂出面创办《上海体育》,标志着上海近代体育刊物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重视下,体育刊物纷纷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和出版机构也空前兴盛,争相出版各种体育专刊(特刊),体育报刊业达到了近代史上的辉煌时期^[35]。

1927—1937年创刊的在上海出版的体育报刊有三十余种,这一时期的体育报刊从内容与形式上都趋成熟,当时在全国最负盛名的为勤奋书局编辑出版的《勤奋体育月报》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辑出版的《体育季刊》^[35]。出版的各种体育专刊(特刊),主要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年刊》《爱国女学体育科十六届纪念刊》等三十余种^[36]。因政府重视体育,教育杂志和综合性杂志也注重宣传体育,这一时期主要有《东方杂志》《现代学生》等近十种杂志出版了体育专号^[36]。

3.5 市民跻身租界侨民组织的体育竞赛

这一时期,在政府和民众的双重推动下,上海对西方体育观念和体育运动项目在接纳—共处的基础上,步入了“竞争”之途,即处于接纳—共处—竞争的发展过程之中。所谓竞争,也就是华人在同西方侨民组织比赛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上海民众跻身租界侨民组织的体育竞赛,开始打破西方侨民独霸一方的局面,使上海近代体育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1922年上海市民陈和清以个人资格参加上海万国竞走赛,穿布鞋走完全程,此为华人最早打破坚冰、进入西人所垄断的体育竞赛的壮举。此后国人勤学苦练,还发起成立上海中华竞走会,组成了中华队。中华队1926年开始参加团体赛,从1928年至1933年,团体和个人冠军全部由中华队取得,令租界侨民刮目相看,以致1933年组织竞赛的外侨,宣布停止举办该赛。1904年在租界侨民中举办第一届上海万国越野赛,1927年后,国人介入此项赛事。1935、1936年国人均获得团体冠军,1935年的个人冠军为华人王正林所得,从此结束洋人称霸此项运动桂冠的历史^[37]。

早在19世纪60年代,足球已在租界侨民中出现。建立于1902年由外侨组成的上海足球联合会(华人称西人足球联合会,简称西联会)曾举办过15种比赛,比较知名的有国际杯、史考托杯和甲组联赛等。国人自组的上海足球队约在1912年出现,其中以共和、乐群、博爱足球队为先导,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乐华队、东华队异军突起。1924年由中华体育协进会创立的中华足球联合会,标志着这项最具魅力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自此,中西球队经常举行足球对抗赛。华人从1924—1925年的第17届“国际杯”开始组成中华队参加角逐,也是华人参加的最早的西联会的竞赛,并获得了第二十二届(1929—1930年)、第二十三届(1930—1931年)、第二十七届(1934—1935年)、第二十八届(1935—1936年)冠军^[38]。

1926—1927年第二十届西联会甲组联赛中,三育足球队首次闯入该项赛事,随后,乐华队获第二十一届(1927—1928年)冠军,东华队获第二十六届(1932—1933年)和第二十八届(1934—1935年)冠军,丽都队获第三十三届(1939—1940年)冠军^[39]。1926—1927年第二十五届“史考托杯”比赛中,三育和乐华两足球队开创华人参加角逐该赛事的先河,随后东华队获得第三十三届(1934—1935年)和第三十四届(1935—1936年)冠军,丽都队获得第三十七届(1938—1939年)和第三十八届(1939—1940年)冠军^[40]。

3.6 传统体育在融汇西方体育基础上走向海外

精武体育会吸收了西方体育以后,赋予了武术新的生命力。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精武体育会出现了迅速发展的趋势,在近代社会的迅速扩展是在1916年至1932年



之间。首先在国内,精武体育会分会多达20余处。1920年以后,精武体育会开始向南洋一带华侨聚居地发展,先后在越南、新加坡、吉隆坡等东南亚各国建立精武体育会达20个以上^[41]。中国传统的武术借助分会网络被输送到海内外各地,各分会成为武术传播的集散地。精武体育会传播的内容除武术以外,还包括舞狮、舞龙、棋类等其它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无疑,精武体育会在东南亚的发展,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向国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2]。

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以后,作为管理中国武术传播的官方组织,多次组织国术海外表演交流活动。1935年8月间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率团赴欧美宣扬国术,考察海外体育,并在欧美各国做现场国术表演。1936年在德国柏林奥运会上做中国武术表演^[43]。表演的大部分队员从上海的武术团体中选拔。国术表演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看法,使他们对近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略有认识,揭开了西方人认识、学习中国传统武术和国术走向国际化的序幕。

4 战乱使“西学东渐”受挫与上海近代体育的消沉(1937—1949年)

1937—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日战争,1945—1949年为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而进行解放战争。从总的趋势审视,由于战乱使“西学东渐”受挫,上海体育在这两大战争阶段基本处于消沉衰落的状态。尽管抗战后上海体育一度出现恢复的迹象,如1946年的第一届公开运动会、上海市第一届航空模型比赛和上海市专科以上田径运动会,1947年的上海市第二届专科以上运动会、全市公开运动会和1948年承办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等,但这些都难以重振20世纪30年代的雄风^[44]。

5 结语

上海近代体育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体育的输入。经过1843—1911年的萌芽期、1911—1927年的兴起期、1927—1937年的繁盛期、1937—1949年的消沉期,近代上海体育实现了现代化的嬗变^[45]。

近代上海体育在西方侨民体育的示范和引导下,走上从惊诧、排斥到调和、吸纳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历程,完成了对西方近代体育从形而下的、反应性的吸纳,到形而上的、对应性的比照,乃至全面的、回应性的融通等3个递进的演进过程,实现了西方体育在中国本土化的“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上海民族传统体育也经历了“解构”到“建构”的痛楚,实现了现代化转型^[46]。

近代上海一方面主动吸纳西方体育文化之精粹,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向全国辐射西方体育文化的重任,上海成为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扩散地。西方体育观念、西方体育运动项目、西方体育组织的管理方式、西方体育运动规则等在上海广泛传播,不仅促进了上海近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而且带动了全国体育运动的开展、体育理论和体育教育理论研究的兴起,缩短了我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之

间的距离,对实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上海体育是西方体育在中国本土化的“变迁”与中国传统体育“重建”的互动的典范^[46]。

“西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变迁”与“重建”的互动过程,是构建多元与共存的学术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的过程,其研究方法需科学、系统、规范。对于西方体育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实现本土化的“变迁”和中国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式的“重建”,我们必须在认真译介研读西方体育理论上对其进行反思。尤其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奥林匹克运动以强势文化之态席卷全球,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空前,如何使西方体育与我国传统体育进一步有机融合、共同发展、多元共存,是值得中西体育界继续深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28.
- [2]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3.
- [3]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29.
- [4]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680.
- [5] 平杰.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竞技体育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04.
- [6]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680-695.
- [7]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3.
- [8]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0.
- [9]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88-289.
- [10] 陈科美.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42-546.
- [11] 陈科美.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51-556.
- [12]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0-31.
- [13]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1.
- [14]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3.
- [15] 梁兆安.记上海青年会体育部(上)[J].上海体育史话,1983(2):27-29.
- [16]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67.
- [17]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6.
- [18]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6-49.
- [19]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3.



- [20]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7.
- [21]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92-498.
- [22] 上海图书馆.老上海风情录(四):体坛回眸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8.
- [23]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01-103.
- [24]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9.
- [25] 上海图书馆.老上海风情录(四):体坛回眸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9.
- [26]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34-140.
- [27]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45.
- [28] 郭玉成,许杰.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的武术传播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5(2):77.
- [29] 许燕秋.精武第一分会绍兴精武会考[J].上海体育史话,1990(4):36.
- [30]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2,107-108.
- [31]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出版社,1996:118.
- [32]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0.
- [33] 上海图书馆.老上海风情录(四):体坛回眸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0.
- [34]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出版社,1996:5.
- [35]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1.
- [36] 匡淑平,虞重干.上海近代体育报刊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8):143-146,150.
- [37]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11.
- [38] 沈文彬.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152-153.
- [39] 沈文彬.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111-112.
- [40] 沈文彬.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133.
- [41] 蔡扬武.从精武体育会看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的交汇[J].体育文史,1992(6):8.
- [42]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47.
- [43] 我国国术表演大受观众欢迎[N].申报,1936,8(13):2.(影印本第343册329页).
- [44]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2.
- [45]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27-28.
- [46]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87.

(责任编辑:杨圣韬)

(上接第17页)

人们理应设想出2025年以后体育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问题。现代体育原本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在眼前则是强势的英美法系的依托物,上海构建体育名城的根本性价值在于彻底厘清国际高端城市建设理念的内在价值。任何一种赛会都无法脱离现代性而独立存在,上海既有的英美法系传统理念应是其高速发展且不至于与世界脱轨的先天条件。还要回到城市的对比类系中。体育城和奥运会的关系更为紧密,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不同,举办奥运会只需一座城市,因此,奥运会始终寄寓着一种城市美学理念,其设计规则以及法系传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赛事价值。在身体学的意义上考量,它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化上海固有价值的未来支柱。

参考文献:

- [1] 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472.
- [2] 张鸿声主编.上海文学地图[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87.
- [3] [美]凯斯纳.资本之城[M].赵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
- [4]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出版社,1996:13-14.
- [5] 郎静.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87-188.
- [6] 乔冉.重塑市民的体育观念:与体育社会学学者陆小聪谈城市体育发展问题[J].体育科研,2016(3):47,47.
- [7]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长沙:岳麓书社,2010:139.
- [8]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M].王菊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190.
- [9] 于晨.腾飞中的上海体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5.
- [10]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上海体育年鉴·1995[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3.
- [11] 林少雄.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96.
- [12] 中国建设报社《建筑创作》杂志社编.点击中国建设:回眸2004·影响2005[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64-65.
- [13]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54.
- [14] 杨上广.中国大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1.

(责任编辑:杨圣韬)